



跨越山海的战火情谊

——回望中国抗战时期的世界印记

80多年前，一群不同信仰、不同肤色的国际友人跨越山海，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，用热血在东方主战场写就了人类反法西斯史上壮丽的国际主义诗篇。

岁月流逝，未泯世界各国的正义火炬；

山河为碑，铭刻血肉铸就的和平祭文！

这片天空，见证异国“雄鹰”的生死守护

重庆万州，夜雨初歇。西山公园，薄雾如纱。

年逾七旬的魏映祥来到香樟树环抱的库里申科烈士陵园。退休多年，他仍保持着每天来这里看一看的习惯。

“擦拭墓碑，清理杂草落叶，讲述烈士事迹。”老人说，为英雄守墓是他这辈子的事业，也是他母亲谭忠惠生前的坚守。

库里申科是苏联航空志愿队轰炸机大队长。1939年10月，他轰炸敌机场凯旋途中遭遇敌机群，飞机左发动机受重创，不得不驾机返航。飞至万州上空时失去平衡开始下坠，为避开居民区，他驾机迫降于长江水面，献出36岁生命。

这片天空 见证了异国“雄鹰”的生死守护

从1937年秋至1941年，苏联派出2000多名飞行员来华支援抗战，有200多名飞行员献出宝贵生命。美国飞虎队援华作战期间，有2000余名队员牺牲。

“飞机坠落的江面距离母亲家仅

2公里。母亲说他是英雄，值得一生守护。”魏映祥说，库里申科墓迁至西山公园后，母亲主动承担守墓工作，一守就是十几年。

母亲退休后，魏映祥接过守墓接力棒。这一守，又是40多年。

“如今为英雄守墓的接力棒正在我们手中传递。”万州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曾锐说。

目前，我国多地建有援华航空志愿队陵园和纪念碑。碑前，常有鲜花盛开；陵园，常有国人照看。

80多年的岁月里，中国人始终未曾忘记他们。

这片土地 见证没有国界的医者仁心

苏联航空志愿队来华几个月后，加美援华医疗队在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率领下，于1938年1月启程来华。

这是一段颠沛又危险的行程——到香港后飞武汉转郑州，从郑州经潼关渡黄河，抵达八路军总部后再设法去延安。

“在延安，他执意前往晋察冀根据地战斗一线。”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原馆长陈玉恩说。

1939年10月，日军发动大扫荡，打算回国的白求恩推迟行程，参加战斗。

战斗打响后，重伤员不断送来，白求恩把手术室设在离前线几里地的小庙里。

记者在河北涞源王安镇孙家庄村北，寻访到了这座小庙。王安镇政府的杨东旭介绍，小庙原是山神庙，“除

了台基被水泥修补外，基本保持当年模样”。

庙旁建有白求恩战地手术室展馆，馆内蜡像实景还原了当时场景——枪炮声中，白求恩正在给最后一名伤员手术。

“他的手指不慎被伤员碎骨刺破。”陈玉恩说，几天后抢救其他伤员时，伤指又遭感染导致败血症。

1939年11月12日，白求恩病逝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。

他去世半年后，印度医生柯棣华抵达晋察冀。站在白求恩墓前，他说要像“白求恩那样上前线去工作”。

“百团大战时，他连续工作13天，为580多人做手术。”唐县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“00后”讲解员田浩莹说。

1942年7月7日，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个多月后，正在编写教学讲义的他癫痫病严重发作，逝于河北唐县葛公村。

葛公村向西20公里是晋察冀烈士陵园。沿台阶拾级而上，尽头是白求恩墓。东南侧，为柯棣华长眠之地。向北十步，有加拿大人尤恩墓。更远处，是奥地利人傅莱墓……

抗战期间，无数异国医者用手术刀在破碎山河间筑起生命防线。

今天，他们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的陵园碑文上、后人记忆中、历史回响里延续。

这条“生命线”见证血肉之躯的负重穿行

站在观景台眺望，一条24个弯

道首尾相衔的盘山公路从山脚蜿蜒而上。这就是被网友评为“中国十大最美公路”之一的二十四道拐。

80多年前，这条公路成为抗战烽火中的生命线。

贵州省晴隆县县史志办公室主任李泽文介绍，抗战期间，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后，国际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运往中国抗日战场，二十四道拐就是这条路的咽喉要道。

二十四道拐长4公里，可山脚到山垭的直线距离仅约350米。沿公路第一弯前行，左边是万丈绝壁，右边是万丈深渊。

为把战略物资尽早运到抗日战场，来自新、马、泰、越等国的3000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参战，在1939年至1942年间，共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，有1000多人永远长眠在这片与他们血脉相关的土地上。

1942年，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，“驼峰航线”承担起中国战场“空中生命线”的运输任务。

沿海拔多在4500米至5500米、随时面临暴风雨、没有通讯和导航、敌机的拦截……就在如此危险和艰难中，中美飞行员共运85万吨的物资，仅美军就损失飞机1500架。

时至今日，不少机组人员仍然长眠于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。

跨越山海，穿越时空。

（据新华社）

一首《长城谣》唱出全民族抗战心声

“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……”前不久，在上海图书馆“红色印迹”纪念抗战胜利主题展上，包括《长城谣》在内的一批老唱片陈列于醒目位置。歌曲《长城谣》，堪称抗战文艺的一个缩影。

诞生于1937年的《长城谣》由潘子农作词、刘雪庵作曲，最初是为抗战主题电影《关山万里》创作的插曲之一，后因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，影片未能完成拍摄，但《长城谣》的词曲谱有幸得以保存。

1938年，已创作多首抗战歌曲的刘雪庵在武汉将新作《长城谣》交给了

青年歌手周小燕。此时的周小燕，作为武汉合唱团的主要成员，因演唱《歌八百壮士》等歌曲已赢得受众关注。当这首饱含山河眷恋的新曲放在她面前，瞬间点燃了她持续为父老乡亲咏唱的热情。

当周小燕为救济难民登上简易舞台，唱出“自从大难平地起，奸淫掳掠苦难当。苦难当，奔他方，骨肉离散父母丧”时，悲怆的旋律和歌词深深刺痛人心，台下听众无不掩面而泣。

周小燕生前曾这样回忆：“当时联想到侵略者在中华大地的烧杀抢掠，每个人内心感受到的都是无以复加的痛苦，同仇敌忾的民族之心，就这么一

步步聚拢起来。”

《长城谣》不仅唱响全国，还传唱到海外。据后来捐资返乡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们回忆，海外游子都深受感召，这首歌唤起同胞无比强大的凝聚力，大家或捐款捐物，或毅然回国投身抗战，融入到大时代的洪流中。

作为《长城谣》的首唱者，周小燕还于二战期间在法国巴黎举办演出并推出唱片，向世界控诉侵华日军的暴行——“高粱肥，大豆香”的中国，正在经历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。

一首《长城谣》穿越烽火，始终激荡人心。20世纪90年代，周小燕登上

长城重新唱响《长城谣》，她还时常教导自己的弟子们，要继续传唱《长城谣》，将中国人民珍爱和平的心声传播到世界各地。

2020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《中国艺术歌曲百年曲集》，《长城谣》被收录在第三卷中。周小燕的学生、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一直坚持向世界推广中国艺术歌曲。他说：“《长城谣》既是艺术歌曲，也是大众歌曲，它代表了那个烽火年代的中国之声，今天的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，在演唱歌曲的同时，将伟大抗战精神接续传承下去。”

（据新华社）

“击中要核”奖旗——

“虎口拔牙”破敌中枢



“击中要核”奖旗。（资料照片）

辽沈战役纪念馆内，陈列着一面绣有“击中要核”四字的珍贵奖旗。这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3营，在辽西围歼战中一举捣毁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指挥部后，因战功卓著受到师部嘉奖而被授予的荣誉奖旗。

1948年10月，东北野战军在攻克锦州后，迅速挥师返回辽西，对国民党军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展开围歼作战。10月25日黄昏，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进抵北镇以东地域，当即命令第7师第21团3营作为前卫部队，要求该部在26日拂晓前抵达黑山胡

家窝棚地区，先期完成敌情侦察、阵地构筑等准备工作，待主力部队到达后发起后续战斗。

胡家窝棚位于黑山县东北10公里处，是当地规模较大的村落，村道路纵横、交通便利。经前沿侦察确认，村庄西侧与北侧分布着三座彼此相连的小高地，其中65高地是区域制高点，可俯瞰控制全村；村庄东侧有东沙河环绕，河水深约80厘米，人员可徒步涉渡，河道的渡河点上还架设有一座便桥。在东北野战军部队抵达前，国民党军已在这几处高地上昼夜加修防御工事，妄图依托地形屏障保障自身指挥机构安全。

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3营受领任务后，即刻向胡家窝棚方向疾速开进。当部队进至距胡家窝棚仅2公里的四间房以东区域时，从当地群众口中获悉关键情报：胡家窝棚村内敌军小汽车密集、电话线密布，往来人员多携带短枪，另有大量汽车、大炮与辎重马车正沿河道移动。带队指挥3营行动的第21团副团长徐锐据此判断，村内大概率是敌军高级指挥机关，正组织部队准备撤退。确认这一关键敌情后，徐锐与3营指挥员迅速统一作战决心，决定不等待主力部队抵达，不惜一切代价发起追击，全速穿插至胡家窝棚，打乱敌军指挥体系，为我主力后续围歼全部敌军创造有利条件。

10月26日早晨，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第7师第21团3营发起进攻，首

先夺取胡家窝棚北山高地，随即以8连2排直插胡家窝棚东侧，牢牢控制住渡河点，打乱了敌军防御部署，切断了敌人向东逃窜的退路。该排顺势攻占敌军重炮阵地，打垮当面的敌重炮营，拦截并击毁敌兵团电台指挥车，直接导致廖耀湘兵团指挥部的加密通讯信号中断。廖耀湘被迫改用明码电报联络指挥，其兵力部署完全暴露，为我军后续迅速围歼整个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极为关键的有利条件。河东方向的敌军见状，紧急集结约两个营兵力向2排阵地发起疯狂反扑。2排官兵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，依托村内独立家屋与村边集团坟地顽强截击、浴血奋战，最终因血肉之躯大部壮烈牺牲。但他们以血肉之躯死死拖住了反扑的敌军，为3营主力巩固既得阵地、扩大战果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8时许，3营大胆穿插，攻取了胡家窝棚村西北小高地。8连3排顺势攻占核心制高点65高地，彻底将廖耀湘兵团指挥所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覆盖之下。此后，胡家窝棚村内的守敌依托工事疯狂反扑，敌我双方围绕村落周边的几处高地展开拉锯争夺。8连3排在65高地顽强据守，全排官兵接连负伤牺牲，最后阵地上仅剩一名战士，仍牢牢钉在阵地上半步不退。战至10时许，7连1、2排在营属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，迅速攻克胡家窝棚西北、西南两处无名高地。当面的国民党残军见势不妙，仓皇向村内四散

溃逃。11时许，3营在友邻部队第3纵队第9师第25团1营的火力掩护下，向村内残敌发起冲击。7连1排率先突入村中，“缴枪不杀”的喊杀声瞬间响彻村巷。村内的敌军彻底陷入混乱，汽车、骡马、溃兵挤作一团。我军随即完全占领胡家窝棚，一举捣毁敌兵团指挥部，廖耀湘在乱军中仓皇出逃。原本具备较强战斗力的敌军西进兵团短时间失去统一指挥，10万大军在辽西平原上成了“无头苍蝇”，全线陷入混乱失序状态，最终被我军以较小代价快速围歼。

胡家窝棚战斗，是我军基层指战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，主动寻歼敌高价值指挥目标的经典战术突袭范例。这场堪称“斩首行动”的战斗规模不大，却在辽西围歼战全面展开的关键节点，起到一剑封喉的作用，大幅加速敌军的溃败进程，让东北野战军主力得以乘势分割围歼敌军、牢牢把控战场主动权。

战后，为表彰第21团3营在战斗中的突出贡献，第3纵队第7师司令部、政治部专门为该营颁发“击中要核”奖旗。这面奖旗长期由原部队保存，1978年12月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。70余年过去，这面历经战火的奖旗虽有岁月留下的残破痕迹，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怕牺牲、敢打硬仗、敢于胜利、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，早已融入我军的红色血脉，代代传承从未褪色。

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长征路上的“文化轻骑兵”黄镇

1935年的春天，在川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间有一支队伍在泥泞中蜿蜒前行。队伍中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人，在行军间隙掏出一个本子，用铅笔飞快地勾勒几笔。战友们笑他“不务正业”，他却认真地说：“打仗是用枪，我用笔打仗——都是为革命作贡献。”

他就是黄镇，中央军委直属政治部宣传科科长，后来人们称他为“长征路上的文化轻骑兵”。

黄镇自幼习画，考入上海美专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迫辍学，辗转加入红军。长征出发时，他随身带了一盒铅笔和一叠毛边纸——那是他全部的艺术家当。

湘江血战之后，队伍减员过半。黄镇看见一位年轻的司号员倒在江边，手里还紧紧攥着铜号。当晚宿营时，他含泪画出《湘江战役》——画面中，号手的身躯与破碎的军旗叠在一起，铅笔的线条粗粝而沉重。这幅画后来被战友们传看，有人说：“看了老黄的这幅画，恨不得再去和反动派打一仗。”

他真正的创作高峰是在遵义会议之后。红军四渡赤水，黄镇跟着部队在黔北高原上兜圈子。在茅台镇，他画赤水河边用竹筒接酒的战士；过雪山，他画衣着单薄的官兵手挽手在风雪中攀行。有时铅笔用秃了，他就用烧焦的木炭代替；纸用完了，就在敌人的传单背面画。

他不在乎技法是否精到，只求“把亲眼看见的东西留下来”。

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。黄镇把一路上积攒的画稿整理出来，竟有24幅之多。这些画以最朴素的线条记录了长征途中的真实场景——没有修饰，没有夸张，有的只是硝烟、疲惫、坚毅和希望。他曾说：“我不是画家，我只是一个历史的速记员。”

这些画稿在抗战期间辗转丢失了大半，新中国成立后仅找回8幅。1962年，《长征画集》终于出版，成为研究长征历史不可多得的视觉文献。

黄镇晚年担任驻外大使、文化部部长等职，但无论身居何位，他始终珍藏着那段用铅笔丈量二万五千里的记忆。1989年病逝前，他还特意嘱咐家人：“那些画稿，一张也不要动——那就是历史本来的样子。”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

“坐冷板凳”的出处

“坐冷板凳”，是现代汉语常用俗语，最早出自明代魏良辅的《曲律》，原为梨园行话。

旧时戏台的靠背椅供演员使用，下场门边的板凳专供锣鼓乐师坐。正式开演前，戏班都会打锣鼓“闹场”，乐师入座演奏，板凳被坐热，场面热闹。如果不奏锣鼓，演员只清唱，场面冷清，板凳无人坐、冰凉闲置，因此梨园把冷清的清唱叫作“冷板凳”。

后来，北方名角小三儿技艺出众、名气颇大。他到上海唱戏时，不愿讨好把持戏院的地痞流氓，遭到对方刻意刁难。演出当天戏院不宣传、不发戏单，场内冷清萧条，还有人起哄喝倒彩。换场时，对方故意撤去戏椅，只在台中央放一条板凳羞辱他，致使演出无法继续。这件事传遍上海后，坐冷板凳开始在民间流行，用来形容受人冷落、被刻意怠慢的处境。

随着语言演变，词义不断拓展：生活中待人冷淡、宾客枯坐无趣，球员长期替补不上场机会、不受重视，都可称为坐冷板凳。如今该词也含褒义，用来赞扬学者、匠人甘于寂寞、潜心钻研、默默坚守的踏实品格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古人夏日也数九

“一九二九不出手，三九四九冰上走。”这首《九九歌》，很多年长些的人都会唱诵。冬日数九之俗，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在民间流传。不过你可能不知道，《九九歌》并非冬日专属，古人夏日也数九。只是，“夏九九歌”出现时间比较晚，宋代才始见于典籍。

“夏九九歌”现存最早的完整版本，载于南宋人陆泳辑录的《吴下田家志》。这本书收录了一首流传于苏州一带的歌谣：“一九二九，扇子不离手；三九二十七，冰水甜如蜜；四九三十六，挥汗如出浴；五九四十五，街头秋叶舞；六九五十四，乘凉勿人寺；七九六十三，床头寻被单；八九七十二，思量盖夹被；九九八十一，家家打炭壑。”

歌谣朗朗上口、通俗易懂，其中“冰水甜如蜜”这句尤其有意思。有宋一朝，冬天藏冰、夏天取用的技术日臻成熟，入夏后市面上也常出现“担夫挥汗卖凉冰”的景象。《武林旧事》中记载，南宋时期临安街头的“凉水”品类繁多，有甘豆汤、姜蜜水等，洋洋数十种。足见这“甜如蜜”三字，既是味觉享受，更是酣畅淋漓的心情。还有“乘凉勿人寺”这句，初看只觉诧异，明明寺庙里绿树成荫，怎么还劝人别去呢？其实古人讲究“避风如避箭”，大汗后猛入阴凉地，冷热一激，反而容易着凉生病。

明代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中的“夏九九歌”，从形式到内容，除了个别词有所调整外，与陆泳版本几乎无异，只是在“九九”这节有细微改动：“九九八十一，阶前鸣促织。”“促织”就是蟋蟀，这是种知寒暑的昆虫，知时守信，这也说明时节已近秋了。此外，清代杜文澜编撰的《古谣谚》也有收录，不过陆泳版的那句“思量盖夹被”被换成了“被单添夹被”，表述略有出入，意思倒是一样，都是在说天凉了，得往身上添被子了。

文人版本相对雅致，而民间流传的“夏九九歌”因融入民俗方言，更加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如明清时期余姚农村里的版本：“一九二九，扇勿离手；三九四九，汗出淌流；五九四十五，晒煞河鲫鱼；六九五十四，乘凉勿得时……”这段歌谣若用浙东方言吟诵，如越剧一般悦耳动听。

相较于“冬九九歌”出世早、流传广的特点，“夏九九歌”更像是一本生活指南，记录着民间夏日生活的情趣和忌讳。

与冬数九始自冬至类似，夏数九也从夏至开始，每9天为一“九”，共81天。古人认为夏至为“阳极阴生”节点，这一天白昼最长、太阳最高，但物极必反，也是从这天起，阴气开始萌动，白昼一天天变短。古人这般选择，既有记录气候的用意，也暗含了一种朴素的时间观：让人煎熬的日子来了，但转折也开始了。

细心的你也许会问：为何“夏九九”比“冬九九”晚出近14个世纪？这是因为在靠天吃饭的古代农耕社会，数九过冬至直接关系到来年春耕，这是整个社会的生存节律。而夏九更多是生活感受，上升不到全社会层面。同时，酷暑固然难耐，但作物生长旺盛，无需过多担忧。

其实无论是“冬九九”还是“夏九九歌”，它们都真实记录了季节气候的变化，普及了御寒防暑的知识，也客观见证了古代群众在历算学、气象学方面的成就，可谓是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。（据《联谊报》）